

明代的海南，文化教育达到了巅峰，进士、举人的数量和质量，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分量，按当时的人口比例，在全国视野中是引人瞩目的，因此有“海滨邹鲁”之称和“海外衣冠盛事”之誉。究其原因，是中央政府对海南岛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，不但选派了一拨拨廉吏和循吏来琼担任要职，同时还从各地调拨了一批批教官到琼州府及属下各州县担任教授、教谕，明初赴任的琼山教谕赵谦，便是最有实力的一位，被誉为“海南夫子”。



《丹山纪行图》(局部) 赵谦曾为顾云屋画作《丹山纪行图》题跋。图上题跋:“赵谦曾为顾云屋画作《丹山纪行图》题跋。图上题跋:‘丹山纪行图’(局部) 上海博物馆藏。资料图”

# 赵谦:「南海木铎」声自远

才学过人，宋濂自称“吾辈不及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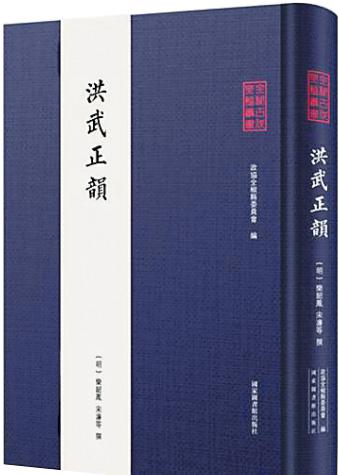
执教琼山，泽被海南学子

洪武十二年(1379年)，朱元璋命词臣纂修官方韵书《洪武正韵》，浙江余姚人士赵谦入京，任中都国子监典簿，参与纂修《洪武正韵》。纂修中，赵谦在学术观点上与同僚发生抵触，老学究们固守旧说，又欺他年少，赵谦自信其说，不肯尽弃所学附和陈腐旧说，不久即辞官归里，在冯村筑“考古台”，足不入城市。

他认为音韵之学，世久不明，遂悉心钻研文字音韵。经过多年探索、研究，取诸家论著证其得失，编撰了《六书本义》十二卷，又继续《声音文字通》一百卷，为学界所称誉，称之为“考古先生”。遗憾的是，据后来与丘濬同时入阁辅政的李东阳的撰述，那本书有12卷，但一直没有刻本刊行，永乐初年被下诏入藏秘阁后，丢了11卷，只留下一卷。

赵谦少年时期就开始博览，考究六经百家之学，曾对学生说过：“谓诗士之为学，必先穷理，穷理必本读书，读书必贵识字，故曰六书明，则六经如指掌。”他的《六书本义》是一部以六书原则来解释偏旁字以及字形结构较难理解的字的著作，六书是指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，是汉代学者许慎将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的6种类型。赵谦为了正本清源，消除由于隶变、俗书所造成的汉字形体结构之义不明的弊端，早年就“研精覃思，折衷诸家之说，附以己见，撰集六书之义”，凡五易其稿，终成《六书本义》一书。

赵谦的学问为当时的学人所折服，宋濂深知赵谦有真才实学，不仅自称“吾辈不及”，还遣儿子宋仲衍拜赵谦为师。后宋仲衍参校《洪武正韵》时，又将赵谦的研究成果采入《洪武正韵》。



《洪武正韵》书影。资料图

本报记者 陈耿

洪武二十二年(1389年)，朝廷搜罗遗落在民间的人才，赵谦再次被起用，朱元璋闻奏，称：“朕知之久矣，朕将老其才而大用之。”连皇帝都久闻赵谦大名，要对他尽其才，于是下旨让他出任教官。翰林院学士解缙建议赵谦“施教化于蛮夷万里之远”，他便选了琼山教谕一职。

解缙在送他赴任的一篇文章中说，教官是圣人的木铎，圣人在南海之滨又多了一个木铎，这是可喜可贺的。

赵谦的到来，确实是海南学子的一大幸事。琼州知府及琼山知县对他十分敬重，特在琼山县学内筑琼台，以此作为他专心著作之所。也许，后世将“琼台”作为海南的别称，就是源自赵谦；他还颁发自己撰述的《学范》，该书分六门：一曰“教范”，言训导子弟之法；二曰“读范”，列所应读之书；三曰“点范”，皆批点经书凡例；四曰“作范”，论作文；五曰“书范”，论笔法；六曰“杂范”，论琴瑟、鼎彝、字画印章之类。

赵谦以当地文教为己任，连那些将子弟和整天舞刀弄枪的一介武夫，也收敛不少，知道向学和慕义。更有从岛外来跟随赵谦读书的士子，比较有名的有合肥王惠、莆田朱继、福州郑观、凤阳孙仲岳和临川吴均。一时间，赵谦被誉为“海南夫子”。

安徽学人王惠博学能文，还当了赵谦助教。解缙称，王惠跟随赵谦“讲明性命义理之学，洁白清修，毅然自立”，评价极高。洪武末年，有大臣将他举荐到京城，王惠却找借口，力辞归隐，不入仕途。足见他们对琼州学子的影响，不只是学识、文章，还有气节、风骨。

就在朱元璋准备重用他之际，赵谦于洪武二十八年(1395年)十月一日病故，年仅45岁，门人对他“含敛祭殡”，就像对待自己的生父。解缙为他撰写了墓志铭。

赵谦的得意门生中，有据可考的仅一人——吴文祥。

吴文祥是琼山人，洪武辛巳年(即1401年，彼时已是建文三年，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沿用祖父的年号)，以国子监学生的身份，回琼掌管琼山县学事宜。朱棣以“靖难”之名夺权改号“永乐”后，吴文祥曾负责募集钱款，迁建琼山县学于府城南郊，彼时，想起英年早逝的恩师赵谦，禁不住潸然泪下，作诗一首悼念夫子：“亲炙先生已有年，深知蕴蓄冠群贤。德全圣学相传后，心契人文来画前。造化经纶图要妙，太虚聚散语精研。于今遗世真无愧，只使愚蒙空自怜。”

王惠尚能渡海而来当“旁听生”，岛内其他州县按理也会有一些慕名北上的“插班生”。据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，赵谦任职琼山后的洪武年间，琼州有25人中举，其中琼山9人，琼州琼山县那邑人符铭于1393年考中举人，1397年再中进士，二甲第四名，成为明代琼山的第一位进士。

大圣遗音琴，制于唐至德元年(756年)。通长120.3厘米，肩宽20.2厘米，尾宽13.5厘米，厚5.2厘米，底厚2.0厘米。桐木制，栗壳色漆与黑漆相间，局部略有朱漆修补。金徽玉轸，形制浑厚，圆形龙池，椭圆形凤沼，琴背题名、大印及铭文都是制琴时镌刻的。腹款朱漆书“至德丙申”四字在池的旁边。制琴的时间，正当安禄山叛变，唐明皇入蜀，太子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的时候。此琴造型优美，色彩璀璨古穆，是琴中之宝。

大圣遗音琴，原藏于养心殿南库。养心殿是清代皇帝的寝宫。南库是收藏贵重物品的库，说明当时确实是把它看得很重的。南库虽是皇帝的珍品库，但

明洪武二十八年(1395年)冬，赵谦病卧不起，弥留时，召集高弟王惠、杨升、徐益等于榻前授言曰：“予闻之，太虚之中，不能不聚而为人物，人物又不能不散而为太虚。其聚其散，盖皆理数之自然，有不能自已者，岂有所为者也。予之此身，在太虚中，如冰在水，而今将为水矣。琼台知心，幸有知此谈别。”

不久，赵谦逝于县学琼台之上。地方官员及弟子公葬于县学东北隅。嗣后，琼籍学子，春秋二扫，成为惯例。成化年间，赵谦墓年久失修，丘濬在家乡为母亲守孝。赵谦的一位后人赵宏翰给他写信，称先祖赵谦“墓荒榛棘，而识者曰寡，未尝不扼腕以叹也”，言外之意是希望丘濬能动用个人的影响力，出面为赵谦修墓。丘濬自然乐意为这位名宦和先贤做此事。

受赵谦精神的影响，丘濬本人对乡土的教育事业也很上心，想到自己小时候读书、借书之难，便出资在府城建起一座“藏书石屋”，购置一批经典图书，造福琼州学子。

1520年冬天，府城东厢攀丹村进士、户部侍郎唐胄也与广东、琼州的官员一起，在琼山学宫东北角找到赵谦墓，修葺一番。唐胄认为，琼山的风化教育，“谓文化治于唐宣宗，礼乐盛于宋中叶，而文风则不变于先生，其有功于吾土也大矣”，评价极高。

再后来，海瑞1570年至1585年在家闲居时，也修过赵谦墓。

清代，海南的官员和学人也先后四次为赵谦修墓。最后一次修墓是在光绪十九年，即1893年，广东督学徐琪捐出自己的俸银，给赵谦筑了石坟，并让琼山县学年年洒扫。民国时期，王国宪等学人曾在府城南门外六角井的右侧见过赵谦墓。



其制造精良。

大圣遗音琴经此次修整，神采照人，恢复了应有的面貌。修整完好以后曾经管平湖试弹，琴音清脆松透。明、清以来的琴书中总结出古人认为最好的琴音具有“奇、古、透、润、静、圆、匀、清、芳”九个特点，称为“九德”，古人说具备“九德”的琴是罕见的。

据现代古琴家郑珉中鉴定，大圣遗音琴属于“九德”兼全，也就是说能给人以完美悦耳的音响感受。传世的唐琴有五张，故宫博物院藏有“九霄环佩琴”“飞泉琴”和“大圣遗音琴”。

(图文经授权摘自《故宫国宝100件》)



## “东坡迷”李光

■ 陈有济

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着伟大的人格魅力，备受时人和后人崇拜，产生了众多的“东坡迷”。南宋名臣李光，就是一个“东坡迷”。

李光(1078—1159)，字泰发，与李纲、赵鼎、胡铨并称“南宋四名臣”，为海口五公祠所祀“五公”之一。李光刚直耿介，晚年因触犯秦桧被贬到海南，先后在琼州(今海口)和儋州(时称昌化军)安置。

远谪南荒，人生遭遇与苏东坡有几分相似的李光，在海南以“追苏”作为心灵自我慰藉的“良方”。

南宋绍兴十五年(1145)三月，68岁的李光经长途跋涉到达琼州。刚到琼州不久，李光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探看东坡双泉。双泉位于今海口五公祠，苏东坡谪儋州路过琼州，发现双泉十分神奇，这两个泉眼相去不远，流出的泉水却味道不同。苏东坡将此发现告诉郡守，郡守遂在双泉作亭，苏东坡欣然为亭取名“洞酌亭”并题诗。李光决定择居在双泉。

九月二日，李光携儿子孟坚正式从官舍搬到双泉新居。为了发扬东坡双泉文化，李光对久已失修的双泉进行修葺，在民间寻找“洞酌亭”旧名，并“复揭之亭上”。居住双泉期间，李光多次作诗描写颂扬双泉。如何才能让人们永远记住东坡与双泉的故事呢？李光在“洞酌亭”上题写东坡《双泉诗》，此外又写了一篇长文《琼州双泉记》，同样是为了“志其本末，使后来者有考焉”。

琼州只是苏东坡路过之地，而儋州作为苏东坡居住3年的地方，留下了更多的东坡遗迹和故事。

绍兴二十年(1150)三月，李光刚到儋州，就和友人魏安石一道造访苏东坡居儋时与友人建起的载酒堂(今儋州东坡书院前身)。苏东坡北归后，昌化知军陈适对载酒堂进行修葺，并在堂内绘苏东坡像，人们常到载酒堂祭奠苏东坡。李光初次杖策到访载酒堂“缅怀苏东坡老”，写下了两首诗(今存一首)，在诗中感慨自己生不逢时，无缘与苏东坡相会。后来，李光又多次与友人游览载酒堂，并赋诗咏怀。

苏东坡留下踪迹的清水池，也是李光常去的地方。清水池在儋州州城西北，池里种满荷花，苏东坡诗句：“城南有荒池，琐细谁复采。幽姿小芙蕖，香色独未改”，描写的正是清水池。昌化知军陈适挖浚并扩大了清水池，筑“宾燕堂”在池上。李光常于清水池与友人集会，饮酒作诗为乐。

李光在儋州还费尽心机搜集苏东坡留下的墨宝。有一次，李光获得苏东坡和陶渊明《始作镇古田》的《载酒堂》二诗手迹。其时“东坡真迹多为有力者取去，所存但摹本耳”，可谓千金难求其真本，尤令李光兴奋的是，此二诗不见于当时的苏东坡诗集中，极其珍贵。获此至宝，李光特地写了两首诗追和苏东坡原韵。

李光与儋州一个名叫许觐的人交往。许觐是东坡的好友许珏的孙子，善书法，他的书法学习苏东坡，但只习得其形，在神的方面还有欠缺。李光推崇苏东坡书法，便指导许觐从东坡书法的源头“二王诸人”学起。

除了苏东坡的踪迹和墨宝，李光还醉心于发扬苏东坡居儋故事。苏东坡居儋期间，在《与程秀才书》中诉说：“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，然亦未悉数，大率皆无尔。”苏东坡“六无”之叹，成了李光写作《六无诗》的题材。后来，李光还写了《跋六无诗卷后》诗，用调侃语气说道：“六无信笔成，无令浪流传。它时达官知，人人愿南迁。”

“东坡迷”李光的居儋岁月，有六年之久。绍兴二十五年(1155)十月秦桧病卒，两个月后朝廷量移李光郴州安置。次年(1156)四月，李光告别友人启程北上，离开苏东坡视为“第二故乡”的儋州故地。



投稿邮箱 wsh\_hndaily@qq.com